

底层文学在现实主义精神关照下的苦难叙事

李文巧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6)

摘要:在当代意义的现实主义精神重塑与作家的主体性精神回归中,作家通过对底层的关注,充分表达着自己参与现实改革的精神愿望。底层文学在触碰苦难主题的时候,呈现着苦难狂欢化、苦难身体化、苦难浪漫化(诗意化)等特征。但是,随着消费主义的影响、底层群体的自身崛起,苦难叙事表现出消费化、模糊化等更多的暧昧因素,底层文学的现实主义的人文关怀也迎来更多的思考和挑战。

关键词:苦难狂欢化;苦难身体化;苦难浪漫化;暧昧空间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92(2019)03-0086-05

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人民”和“大众”都成为这段时期表达中国民众集体生存状态的核心名词。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命意义在群体中,在国家的革命意识和历史建构中实现。80年代开始,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却“总被看成是绝对对立的”^{[1]214},90年代的“个人化身体写作”更是进入了对于“集体”意象漠视的阶段。除此之外,生活也还原为一种人的日常性存在,“琐碎而又艰辛的日常生活磨损并淹没了人的精神追求,对现实的抗争转化为与现实的妥协和无奈认同。”^{[2]139}

集体理想的消失、个人精神的自由,关注日常生活的存在都成为时代的主题。但在这种时代主流背后,当代作家的现实主义精神也慢慢回归。它一方面是五四时期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延续;另一方面它不同于五四时期的革命精神,而是关注“一时一地、一家一国的‘当前的’、‘实际的’、‘具体的’问题”^{[3]432},是一种关注生活真实的改革精神。正是在这种当代的现实主义精神的重塑过程中,作家们也开始关注集体,将人重新置入社会群体来进行审视。比如,将底层群体作为关注对象,反映底层群体生存状况的底层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在作家现实主义的精神回归中,关注底层群体的物质的、精神的生存状态,而其中对底层民众苦难的关注和如何展现底层苦难成为底层文学的题中之义。在现实主义精神的参与下,苦难叙事成为底层文学反映现实的一个特殊维度,苦难也成为了底层文学的

一种美学的动力机制。从曹征路的《那儿》《霓虹》、罗伟章《我们的路》,到贾平凹、阎连科、陈应松、刘庆邦等的一系列作品中,作家对底层群体的苦难书写中都倾注了对现实的关怀精神。关于底层的作品苦难叙事也逐渐呈现出狂欢化、身体化、浪漫化(诗意化)等特征。

一、苦难叙事的狂欢化

苦难叙事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底层群体真实的生存处境,苦难越深刻悲壮越能反映现实生活所存在的问题,苦难弥漫的同时也能反映苦难者面对自我的生存之苦,也会呈现出无知的或狂欢的精神状态。

以贾平凹的《高兴》为例,小说深刻地展现了农民工艰苦而无尊严、无前途的生活,这种生活的苦难从物质到精神深刻而厚重:“吃血喝血”的地方官员的冷漠、韩大宝为代表的势力群体的奸诈、五富为代表的被欺负群体的诚实无助、孟夷纯所代表的被迫卖淫妇女的无力和善良,形成一种双向的互动,里面隐含着作者对于底层群众深深的关切和对无良分子深深的谴责。这篇作品以小见大,从细微入手,成功地展现了进城男女的苦难命运的三层苦难:首先《高兴》的主人公们必须面对物质的贫苦。刘高兴那一句“有了垃圾,我们就能存活下去,垃圾越来越多,我们生活的质量就会提高”。一句告白直面现实,具有暗讽意味。让我们在体会苦难的时

候陷入一种理性的反思,力透纸背。但是刘高兴和五富在面对低收入的苦难生活中,竟然发现垃圾市场背后“黑市”交易、医院的医疗废弃物等暗交易可以发财的事情。苦难的背后呈现出一种发财梦的狂欢,并且这种物质财富的狂欢是违法的犯罪的狂欢,这样意味深长的现实批判性扩充了小说的内在张力。老舍的《骆驼祥子》探讨了淳朴人性在现代文明都市中被侵蚀的悲剧性,《高兴》也探讨了小说人物在苦难的背后所呈现的堕落式的发展倾向。所以,苦难的第二层含义就更为深刻:要想要脱离物质的苦难就必须丧失诚实等淳朴的本性,面临精神堕落化、心灵腐蚀化的倾向。另外,以刘高兴为代表的城市身份的自我建构和想象更是展现出一种精神、尊严不得认可的心理焦虑,使得《高兴》这篇小说的苦难上升到第三个层次。身份的认同感即是一种生存的尊严感、存在感、平等感的精神需求,就如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所展现,人的需求层次必定是从物质到精神的扩充与填补。但是,在物质的苦难,精神堕落化和城市身份不得认可的焦虑中,小说的人物不得不开始自我的狂欢:刘高兴自我的阿Q式的满足、杏胡和朱宗两口子的性狂欢,黄八堕落化的吃喝玩乐、孟纯姨不停歇的性交易……他们都在城市生活的缝隙中寻找生存的可能,在苦难中不自觉地陷入一场无知的苦难的狂欢中。这样不自觉地狂欢最后也终将是无路可走。因此,最后孟夷纯、杏胡、朱宗的被抓,五富的惨死就增加了苦难无解的沉重与悲壮^[4]。

张炜的《九月寓言》里,封闭小山村的人群贫穷、落后,苦难泛滥,最后小山村在与矿区暴力的、性的、苦力的交流中走向衰败,最终毁灭^[5]。阎连科的《受活》中,残疾人的苦难生活成为直接的商业消费,最后也不得不接受金钱的狂欢背后更为残忍的毁灭性灾难。这两部作品不仅叙述底层群体接近绝境的生活状态,还更继承了鲁迅所开创的国民性批判的传统:苦难的舞台化表演,看客的不自知,“看者”与“被看者”共同的麻木与劣根性。让人在这种苦难舞台化的狂欢中感到一种沉重与压力,其实背后潜藏着的对苦难的同情与批判共存^[6]。

不可否认,苦难的叙事就是需要赢得读者的同情,苦难越丰满所展现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就越饱满,作家严肃的批判精神就得以深刻地展现。但如果苦难泛滥成一种读者或者苦难者所共有的狂欢,苦难叙事就会在苦难狂欢的过程中,使苦难变成一种文学的消费行为,因此埋下祸根。

二、苦难叙事的身体化

苦难叙事的身体化是作家对苦难书写过程中一种独具匠心的写作视角,能够更为具体、侧面地呈现着对不同底层人群的关照。

如《马路上不长庄稼》的丁美兰,贾平凹《高兴》中的孟夷纯、翠花,《秦腔》中的翠翠等人本是底层妇女的代表,在物质资源不平等的社会环境中,自身缺乏正确合理的求生本领,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身体,通过性交易取得生活的物资,被迫地销售自己的身体。丁美兰本来淳朴、善良,却从保姆变成了美容院的娼妓^[7];孟夷纯在被动求生中也不得不出卖肉体,失去自我;翠花从事保姆工作却被男主人猥亵,最后靠刘高兴他们救出;《秦腔》里的翠翠在主动求生中追求性的狂欢,没有自我^[8]。底层妇女在苦难的求生过程中不得不陷入性的泥淖,肉体会变成沉沦的工具,作家对女性的生存命运倾注了特有的关照。

刘庆邦的许多作品则展现了对于底层矿工的关注。如《踩高跷》并没有直接表现矿工工作的艰难,但对矿工的身体进行细节性的疾病书写。乔明泉的亲爹死在矿难中,继父也一直承受着病痛的折磨,文中的细节刻画让人不寒而栗。而屈明泉原来“不仅能在高跷上健步如飞,不仅会搭车轱辘,玩鹌鹑子翻身,还两腿一展,突然来个大劈叉”,“他把大劈叉由一个大字劈成一个土字之后,不借用任何辅助的力量,还能自己从土地里长起来”,最后健康的屈明泉也在矿难中残了腿,再也不能正常地行走,更不能踩高跷^{[9]186-188}。小说对乔明泉矿难事故后的身体残疾作对比式的叙述,让苦难通过身体得到了具体而微的展现,并且悲苦的命运通过身体的残缺在一代又一代子孙间复制式传播,也增加了小说的沉重感。阎连科《受活》中断腿猴的单腿飞跑、聋子马的耳上放炮、单眼儿的独眼穿针、瘫媳妇的树叶刺绣、小儿麻痹的脚穿瓶子鞋等等叙述,这看起来是令人惊奇的绝技,却是身体残缺者悲苦命运的深刻同情。

陈应松《太平狗》中的太平狗更是人物身体动物化的典型。太平狗最开始有十足的野性、健康的战斗力、是极强的自尊自强的形象,正是程大种健康生命的活力与对城市充满幻想和希望的鲜活形象;而太平狗被程大种所伤、所卖,以及受城市所不容的险途就是程大种本人被姑妈嫌弃、“抛弃”,生存无门,最后惨死的历程。小说笔触犀利、尖锐地展现城市亲情的冷漠、入城农民工生存无门的艰

辛。大量有关狗的身体的描写(也是程大种命运的象征),写得格外的精彩:入城之前,太平狗“腿长,眼像度了层金子似的,炯炯有神”;回到大山的时候,“狗一走一瘸,浑身裹满了尘土,身子已像一个纸糊的架子”^{[10]218-219}。小说用特殊的角度,精彩的语言给我们展现了处在底层社会的善良、勤劳、无助的民工在面对险恶的生存环境的真实经历。

这样的作品还有许多,在作家苦难身体化叙事的过程中,无论是对特殊人群的底层关注,还是细节性的苦难书写,苦难都离不开身体叙事,甚至出现人物生命动物化、异化的倾向。这样使得苦难叙事更为具体、生动,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会迎合读者的猎奇心态,由此埋下祸根。

三、苦难叙事的浪漫化

底层文学在现实主义的审美精神下形成了自己真实的现实主义审美原则,但是,作家在关照苦难的同时会运用一些浪漫主义情愫的诗意写法。

贾平凹的《浮躁》里面的金狗、大空^[11],《刘高兴》里面的孟纯姨、黄八、石热闹等人,他们在苦难中的相互依靠、相互帮助,都可以觉察作家在苦难现实中所倾注的人性之美和生活之光。迟子建的《踏着月光的行板》关照林秀珊和王锐这对进城打工的夫妇,虽然夫妻不能经常相聚,但是两人间小有波折的爱情故事、生活中夫妻的相互照顾也是让人常常感到生活的美好^[12]。这类作品一方面写了底层人民生活和精神蒙受的艰难,另一方面则写出底层人民的浪漫气息。底层人民不再是悲悯式的,被损害和被蹂躏的对象,他们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有着对生活浪漫化和审美化的感受。

刘庆邦的若干作品就是苦难诗意化、浪漫化的典型代表。《空屋》写出一位农村的好强的单身母亲终其一生的愿望就是能修建一所属于自己和儿女的房子。虽然在母亲临终前,儿女们赶着为老人建造了一所漂亮的房子。但是在时代的迅速变迁中,母亲一辈子吃苦耐劳所想要建造的房子最终成为废墟。小说采用儿子的视角参与母亲的梦想,弱化了母亲所经受的苦难,增加了儿子抒情性的感悟和情感。充满了散文化的艺术语言,文笔朴实、感人,在读者阅读苦难的同时,也体会到了儿子对于母亲的呵护、理解、感恩之情。《一捧鸟窝》讲的是一对失去母亲的俩姐弟相依为伴的成长故事。小小年纪的姐姐为了照顾弟弟上学,自动辍学,成为一个全面的小能手,颓废的父亲选择逃避自己的压力与责任,外出打工不归。父亲一旦回家却带回妓

女,使得两姐弟成为彻底的弃儿。面对父亲的醉酒、乔阿姨(妓女)的野蛮和霸道,两兄妹将痛苦吞咽,两兄妹相互依靠,心灵默契只认认真真关心一个“鸟窝”的命运。“鸟窝”的意象化处理充满诗意化,展现出两姐弟在苦难生活中建立起来的坚韧、朴实、善良的可贵品质和纯真的亲情。《种在坟上的倭瓜》书写一个小女孩在父亲坟头上面种倭瓜的故事,更是将一个失去父亲的小女孩的孤苦与苦难生活写成了一首绝美的抒情诗。倭瓜的藤蔓更是连接了生与死,连接了女儿对于父亲真实的情感倚赖。倭瓜也成为了诗意的爱和希望的象征^[13]。

无论是以乐景写哀情的笔法,还是美好的象征性画面的寄寓,许多关照底层的作品在苦难叙事背后都有浪漫化的手法或诗意化的处理。由此以来,展现作家群体对于底层群体的一种真实关切。但是,这样的关切会不会因为作家的想象化、浪漫化处理使得苦难弱化,会不会因为苦难者心境的变化而使得苦难“无根”^[14],这都是值得人深思的话题。

总的来说,作家们在关注底层时进行的苦难叙事,无论是苦难狂欢化、苦难身体化、苦难浪漫化(诗意化),都可以深切地、细致地、温暖地反观现实,关照底层,寄寓现实的批判理想和人文的关怀情愫。但是,如果苦难过于泛滥,苦难的身体成为读者或苦难者本身的消费品,苦难因为作家的浪漫化处理或者苦难者本身的不自知,这样苦难就会面临着苦难的消费化、苦难的消解化等危机。

四、苦难叙事的暧昧空间

当苦难成为一种常态,甚至变为一种迎合观众猎奇的消费品,那么,作家们对于底层的关照就会面临着远离现实主义精神的危机;另外,当底层群体随着自身的崛起,底层的苦难群体发生了转移,那么,关于“底层的苦难是什么”和“苦难的主体何在”的讨论则出现了更多暧昧不清的元素。

1. 苦难的消费化

在现实主义观照下面的苦难呈现狂欢化、身体化的倾向。但是,随着身体写作、网络文学等兴起,文学写作面临着商业化的危机。在苦难叙事的过程中,如果一味地满足消费社会中阅读趣味中呈现的消费化和欲望化倾向,就会产生一些过度苦情化、欲望化的作品。

陈应松的《人瑞》将一个只有八十岁左右的孤独老人过度地包装成为一个115岁的“第一寿星”,用苦难来刺激当地的旅游收入。小说的苦难叙事呈现出闹剧般的喜剧感、悲剧感和荒诞感,被包装

出来的苦难更是一种生活苦难虚假化的直观反映^[15]。阎连科的《日光流年》用史诗性的手法,讲述耙耧山三姓村的人们为了活过四十岁,一代又一代的村民活在希望里折腾,希望永远都不会到达,但是有活着的勇气才是最宝贵的。但是,小说在深刻的寓意之外,苦难泛滥成灾:男人“割皮”、女人卖肉,为了抵御饥饿,牺牲小孩的生命、甚至用死人作诱捕乌鸦、吃乌鸦肉等细节的描述确实让人感受到生命存在的荒凉与压抑,但也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似乎有着苦难过度化,泛滥化、消费化的猎奇倾向^[16]。

在苦难沦落中,底层妇女产生出一系列妓女形象,小说叙事也呈现典型的逼良为娼的“苦难沦落”叙述模式。^[17]这都是现代作品中《月牙儿》里面的月牙儿、《日出》的小东西、翠喜等苦命女性命运的延续。因此,在苦难狂欢化、身体化的过程中,身体、爱欲会变成直接的消费对象。例如荆歌的《计帜英的青春年华》展现普通女工计帜英苦难的命运。窥探着自己的言行、觊觎自己钞票的守寡母亲、白痴的哥哥、杀人犯的男友等都成为计帜英生活的负担。但自从计帜英认识马科之后,她的苦难史渐渐变成了性的狂欢史,关于计帜英的身体书写也渐渐变为了欲望的书写。欲望化的书写大于了对苦难本身的关照,小说似乎变成读者窥探情欲的作品^[18]。

2. 苦难的模糊化

在苦难浪漫化叙事的过程中,不仅会出现苦难主体模糊的倾向,甚至苦难没有意义,苦难的本质难以被确认。

(1) 苦难的无根。苦难承受者对其自身苦难的自觉与不自觉的忽略。贾平凹《高兴》中的刘高兴、《秦腔》中的引生,都是在苦难的打压中成为一个自觉的不自觉的阿Q式的人物:尽管常常被人欺凌、剥削,但是却对生活充满希望、满足,善良、天真,有时甚至表现出一种变态的乐观与豁达。当苦难的承受者不觉得自己承受苦难的时候,那么人就不会觉得自己受过苦难,因此,底层群体的“问题不在于当代生活有没有痛苦,而在于人们根本无法理解生活痛苦”^[19]。文学写作会不会在写作者想象的空间中制造自我的精神快慰。因此,关于底层群众的苦难叙事在创作者与底层之间就出现了更多不可靠叙述的可能性。

(2) 苦难者群体的模糊。苦难者的身份受到怀疑,边界更加模糊。刘庆邦的《回家》讲述一个底层的大学毕业生外出工作打工被骗,甚至陷入人身受

威胁的危险。主人公的求学生涯并没有实现“鲤鱼跳龙门”的理想,反而在后来狼狈回家、尊严受损后,再次外出以卖苦力求生^[20]。这篇小说反映底层的对象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卖苦力的进城的农村人员,更是一群新的弱势的、有一定知识的或基础的人群,甚至是中产阶级。那么,底层主体的边缘似乎也发生了变化。陈应松《火烧云》里面的龙海义,刘庆邦《黑白男女》里面的蒋志方,他们都作为施救者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成为另外一个新的苦难阶层。中产阶级的崛起,底层群体的崛起等使得苦难主体的边缘日渐模糊。

(3) 苦难本身的模糊,苦难的精神化倾向明显。苦难本就是复杂的,物质性苦难和精神性苦难本就是共存的,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变化,物质供给得到一定的保障,精神性的苦难就更为丰满。

刘庆邦《黑白男女》讲述一场瓦斯爆炸使138名矿工丧失生命,产生了138个不完整的家庭。卫君梅、郑宝兰为代表的单亲矿工妻子在面对家庭破败、物质生活和亲情压力中坚强生存。小说不仅以小见大,展现矿工妻子的在苦难中倔强的生存风貌,更难得可贵的是深入关注她们在面临爱情选择、亲情暴力等精神压力下面的坚强、独立的女性气质。婆家的猜疑和攻击、儿女的幼小与无助、自身生活的无依靠成为巨大的网络笼罩在她们的面前,苦难已经转化为了无形的精神性的存在^[21]。《高兴》中想要获得城市身份认同感的刘高兴,因自身精神状况的不完美而进行自主性的挣扎;《受活》中判断能力被眼前利益所驱使的而没有尊严的受活人,他们都是一群可怜而无助的弱势群体。

陈应松《火烧云》讲述了扶贫工作人员龙义海进入偏远山区扶贫,最终却惨死在那里的故事。但小山村的贫困不仅仅是物质资源的贫困,更多的是人的正义、文明等精神资源的贫困。村里面的“地头蛇”和村长相互勾结,为己不顾集体,自私自利;善良的、愚昧的,备受其辱,但是又贪财求利的普通村民。各种矛盾在小说中集中,展现了人性的贪婪、罪恶、善良、正义等等主题。最后,野蛮的火烧死了龙海义,烧死了这个无权无钱,关爱贫苦人民但却无能为力文明的使者^[22]。所以,当底层民众开始变成不是单纯的底层民众,而是创造底层生活的刽子手,他们甚至在愚昧之中支持违法犯罪的行为;他们甚至自己也违法犯罪,使得正义的人受到拘束,备受折磨。《九月寓言》中傲慢自是的“鲢鳊”们都在不自知的苦难中封闭自我,愚妄自大,最后备受挫折与苦难。鲁迅曾经看到“封建传统伦理道

德的数千年的长期贯彻,造成的不是个别的生活事例和部分的社会现象,而是沉潜在广大社会群众心理素质和思维中的慢性隐毒,是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表现着关于人的价值观念的荒谬性。”^[23]在这样锐利的审视中,对底层群体的精神苦难的关注算是鲁迅国民性批判、“立人”事业的延续与发展。

在新的时代中,底层群体面对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苦难会更加脆弱、敏感。底层群众精神的苦难,有外界压力的原因,也有自身的原因等。作家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底层群体的新的精神苦难,追溯其原因方可更为恰当地关照现实,展现现实主义精神更多的当代价值。

底层文学的讨论之初就存在着其“精神的暧昧”^[24],如作家的不可靠叙述、社会分层,大众市民话语权、底层文学与左翼文学的关系等讨论都是非常热烈严肃的话题^[25]。其实,在现实主义精神的美学精神回归中,作家对于底层的关注展现过现实的批判性与严肃性,这都是底层文学所提供的可贵价值。只是,在消费主义和底层崛起等时代变化中,苦难叙事出现消费化、模糊化等倾向。在新的变化中,“苦难给谁看”“苦难的意义”“苦难的主体何在”“苦难是什么”,如何更恰当地反映新底层群体的生存状况,底层文学的苦难叙事如何与现实主义精神结合、与消费主义潮流所区分,等等问题都为底层文学的苦难叙事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美学空间,也为作家的创作提出更高的要求。

参 考 文 献

[1] 滕翠钦.被忽略的繁复 当下“底层文学”讨论的文化

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 [2] 蔡翔.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
- [3] 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
- [4] 贾平凹.高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 [5] 张炜.九月寓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6] 阎连科.受活[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 [7] 王光瑞.马路上不长庄稼[J].青年文学家,2006(6):5-23.
- [8] 贾平凹.秦腔[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
- [9] 刘庆邦.刘庆邦小说[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
- [10] 陈应松.陈应松作品精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
- [11] 贾平凹.贾平凹长篇小说典藏大系 浮躁[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
- [12] 迟子建.踏着月光的行板[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
- [14] 陈晓明.无根的苦难:超越非历史化的困境[J].文学评论,2001(5):72-79.
- [16] 阎连科.日光流年[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
- [17] 雷鸣.新世纪小说中妓女形象谱系与中国现代性问题[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121-128.
- [18] 《花城》杂志社.花城中篇小说精选:下[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
- [21] 刘庆邦.黑白男女[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 [23] 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 [24] 白浩.底层文学精神的暧昧——兼谈一个文本《马路上不长庄稼》[J].文艺争鸣,2008(7):161-165.
- [25] 白浩.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书写与讨论[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6):23-31.

The Misery Narrative of the Bottom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alistic Spirit

LI Wen-qiao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6,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econstruction of realistic spirit in the contemporary sense and the return of writer's subjective spirit, authors fully express their aspiration to contribute to the reform in reality b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people at the bottom. When it came to the theme of tough life, the bottom literature tends to pres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arnival, body and romantic (poetic) narration in the illustration of sufferings. However, on account of the impact of consumerism and the rise of the bottom class, the misery narrative is permeated with ambiguous themes such as consumerism and uncertainty. Therefore, the realistic humane care of the bottom literature is faced with more thinking and challenges.

Key words: the carnival narrative of sufferings; the body narrative of sufferings; the romantic narrative of sufferings; ambiguity

【编辑 王思齐】